

王瑶全集

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



王瑶全集

第四卷

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编辑说明

本卷收入《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

《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系 1953 年 8 月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4 年 3 月曾再印。1982 年 11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修订重版。此次编入本卷即以修订版作为定本,参照初版本予以校正。对章节名称、正文、引文等变动的情况,择其要者另加编者注说明之。其中第十六章第六节“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则以作者生前写就并寄出版社预备再印时录入的手稿为准,并据此对关于路翎小说的分析文字做了少量的删节。修订版下册把初版附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1949 年 10 月—1952 年 5 月)》删去,以保持全书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学史的完整面貌,今将此文移入全集第八卷的《润华集》中。

1990 年 12 月

目 录

第三编 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 (1937—1942)

第十一章 抗战文艺的动向	5
一 新的情势与新的组织	5
二 “文章下乡,文章入伍”	13
三 通俗文艺与大众化问题	20
四 “民族形式”的论争	25
五 思想斗争	32
六 创作趋向	39
第十二章 为祖国而歌	45
一 战声的传播	45
二 诗的主流	50
三 “七月诗丛”及其他	64
四 抒情与叙事	69
五 “诗的艺术”	78
第十三章 战争与小说	86
一 战时城市生活种种	86
二 变动中的乡镇与农村	96
三 新人与新事	108
四 战争与人民	123
五 经历与回忆	132

2 王瑶全集·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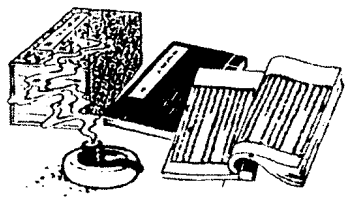
第十四章 抗战戏剧·····	143
一 剧运与剧作·····	143
二 抗战与进步·····	152
三 敌区与后方·····	161
四 历史故事·····	171
第十五章 报告·杂文·散文·····	187
一 报告文学·····	187
二 杂文·····	195
三 散文随笔·····	201

第四编 沿着《讲话》指引的方向(1942—1949)

第十六章 新的人民文艺的成长 ·····	211
一 文艺界整风前后 ·····	211
二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	217
三 工农兵群众文艺活动 ·····	221
四 国统区文艺运动 ·····	233
五 思想斗争 ·····	246
六 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 ·····	253
七 创作趋向 ·····	260
八 全国第一次文代会 ·····	264

第十七章 人民翻身的歌唱	274
一 工农兵群众诗	274
二 长篇叙事诗	289
三 政治讽刺诗	303
第十八章 新型的小说	315
一 解放区农村面貌	315
二 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	325
三 部队与战争	336
四 工厂与生产	347
五 腐烂与新生	355
六 烦闷与愤怒	361
第十九章 歌剧与话剧	371
一 新歌剧的产生	371
二 新歌剧	378
三 新话剧	391
四 国统区话剧	408
第二十章 报告·杂文·散文	420
一 通讯报告	420
二 杂文	435
三 散文游记	442
重版后记	450

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



第三编

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

(1937—1942)

第十一章 抗战文艺的动向

一 新的情势与新的组织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要灭亡全中国,向北平南郊芦沟桥发动了进攻,从此遂展开了八年民族革命战争的局面。在芦沟桥事变的次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其中说:“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7月17日国民党在中共全国人民督促下,也发表了庐山谈话,确定了全面抗战的方针。于是中国人民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结成了;除了汉奸卖国者以外,全国各阶层的人民都成了盟员。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实际上领导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爱国的行动。“八一三”上海战争开始后,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7月7日的芦沟桥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在武汉失守(1938年10月)前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

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1]在这种全国人民一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的情势下,有着革命传统的文学自然必须成为教育和动员群众的武器;必须反映新的现实,和战争密切结合起来。事实上从战争一开始,就已经有许多作家投身于战时或战地的服务了。战争使他们从书房亭子间解放出来,走向了农村、部队和小城镇;使他们接近了现实,突入了新的战斗生活。到处都有作家的足迹,无论在前线或后方;而且参加了各种方式的实际工作,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种接近人民的战斗生活对作家自己也同样起了教育作用,使他们向现实跨进了一步。但初期这些活动多半还是属于一种无组织的、散漫的、个别的、最多是小集团的活动,不足以配合抗战现实的需要,于是成立一种共同的新的组织,就成了大家普遍的要求。同时由于现实斗争的激化,新的作家和文艺青年也增多了。他们要求领导和教育,以更好地为抗战服务。这也是促使文艺界新的组织成立的一种原因。于是为了文艺工作者的广泛动员和发挥更大的力量,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了。下面是当时发表的《发起旨趣》:

漫天轰炸,遍地烽烟,焦毁的城市,血染的山河,在日本强盗帝国主义的横暴侵略中,中华民国正燃起了争取生存与解放的神圣炮火。半年来抗战的经验,给我们宝贵的教训,一个弱国抵抗强国的侵略,要彻底打击武器兵力优势的敌人,唯有广大的激励人民的敌忾,发动大众的潜力。文艺者是人类心灵的技师,文艺正是激励人民发

动大众最有力的武器。数年来为了呼号抵抗,中国文艺界无疑地尽了广大的责任。但自抗战开展以来,新的形势要求我们更千百倍的努力。而因中心都市的沦陷,出版条件的困难,文艺人的流亡四散,虽一方产生了大量新型的报告、通信等文艺作品,且因抗战的内容,使新文艺消失了过去与大众间的隔阂,但在一切文化部门的对比上,文艺的基本阵营,不可讳言是显得寂寞了一点。反视敌国,则正动员大批无耻文氓,巨量滥制其所谓战争文学,尽其粉饰丑态,麻醉民众的任务。我们感到文艺抗战工作的重大,散处四方的文艺工作者有集中团结,共同参加民族解放伟业的必要。过去中国文艺界虽有几次全国性的组织,但是因种种原因不能一致,总不能有好的成果。现在情势已完全不同了。全国上下,已集中目的于抗敌救亡……,抗战形势,日益坚强,政治上的统一战线日益巩固,除了甘心媚敌出卖民族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的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像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民族的命运,也将是文艺的命运,使我们的文艺战士能发挥最大的力量,把中华民族文艺伟大的光芒,照彻于全世界,照彻于全人类。这任务乃在我们全中国从事文艺工作友人们的肩上。我们大声呼号,希望大家来竖起这面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大旗!

这的确是“五四”以来最为广阔的包括全国所有文艺工作者的统一战线的组织。这个组织一直存在下来,不仅对促成团结

和领导全国文艺青年参加抗战工作上有很大的贡献,而且使各派作家在彼此接触的过程中,加强了互相了解和影响,推动了文学本身的发展。事实证明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一切进步的 and 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们是完全可以团结在一起的,并且在互相影响与批评中能够彼此更加进步和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力量。以后文协不只在各地成立了许多分会和通讯处,组织遍于全国(会章规定“凡所在地有会员十人以上,方得成立分会。”不足十人者暂称通讯处),而且文学各部门中的统一战线的团体也都陆续成立了。例如原来在上海的全国戏剧界救亡协会就又在汉口改组成立为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而且包括话剧以外的一切剧种,在团结旧艺人为抗战服务方面也尽了很大的力量;他们的工作在抗战初期获得了极优异的成绩。剧协成立《宣言》说:

在首都失陷华中危迫的今日,集合于武汉的全国戏剧界同人,动于共同的要求,有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之组织;并在光明大戏院举行成立大会。在这样盛大的开始,敢举数点,告我全国同志:第一,我们的团结是为着抗战。……第二,只有抗敌使我们团结。……第三,我们虽不是技术至上论者,但我们相信中国戏剧艺术必因和抗敌任务结合,能摒弃过去的积弊,开拓新的境地。……第四,中国已经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天下”,也不是一个孤立现世界的荒岛。他已经是文明世界重要的一环,他的运命不仅影响其他主要国家,尤其给世界上被压迫民族,被侵略的国家以绝大的暗示。……我们不可忘记把我们的戏剧艺术作为国际宣传的工具,因为获得全世界

的同情和援助而使敌人孤立,实为我们争取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

戏剧工作者在上海形势紧张时就编组了十二个救亡演剧队,分发到前线、大后方和敌后去工作,连六岁到十六岁的孩子们也以孩子剧团和新安旅行团的名义,团结在新的演剧活动下面了。“据抗战三周年的统计,连民间剧团计算在内,全国各战场的新演剧队伍,约有三万以上的戏剧兵之多。”^[2]1942年田汉在《关于抗战戏剧改进的报告》一文中说:“中国自有戏剧以来,没有对国家民族起过这样伟大的显著的作用。抗战以前,戏剧尽了推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开始以后,戏剧尽了支持抗战鼓动抗战的作用。抗战到了现阶段,戏剧又尽着正视今天现实,唤起大众更坚定更勇敢争取最后胜利来到的作用。”当然,戏剧由于它本身是集体性的综合艺术,比较更容易直接为抗战服务;但别的部门的工作者也同样地卷入了抗战的洪流,大量的诗、报告和通俗文艺的制作,就说明了作家们工作的努力。而这些努力的成绩,都是和文协及其他姊妹协会的组织领导不能分的。郭沫若在纪念文协五周年时说:

抗战以来在中国文艺界最值得纪念的事,便是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结成。一切从事于文笔艺术工作者,无论是诗人、戏剧家、小说家、批评家、文艺史学家,各种艺术部门的作家与从业员,乃至大多数的新闻记者、杂志编辑、教育家、宗教家等等,不分派别,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这是文艺作家们的大团结,这在中国的现代

史上无疑地是一个空前的现象。继这文艺界抗敌协会而起的有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全国性质的姊妹协会出现,蓬蓬勃勃,风起云涌,形成了文艺行列的大进军,作家团结的豪华版。但这个高潮时代可惜只局限于武汉作战的短暂期间,其后几经迂回曲折,有些组织已在无形中匿迹销声了,而最先产生的文艺界抗敌协会却能迎接它的第五周年,成为文艺界继续团结的旗帜,这怎么也是值得令人加倍庆贺的事。^[3]

为什么有些组织会销声匿迹了呢?这并不是作家们自己消极了,而主要是自武汉失陷以后,政治情况发生了许多变化,进步的活动受到了限制。自从汉奸汪精卫等公开投敌以后,国民党政府开始了政策上的变化,将其重点逐渐由对外转移到对内,“消极抗战,积极防共”,对人民的抗日进步活动施行镇压取缔的手段。1939年国民党反动政府采取了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将抗战初期给予了人民的一些权利完全收回;接着发动了好几次反共高潮,而1941年的皖南事变,尤其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对人民的屠杀。1939年抗战二周年纪念时,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战争就是在这样的英明领导下才克服了危机,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同志说:

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

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4]

这也同样说明了文学运动的情形，它以后也是在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下发展着的；文协的坚持工作就是例子。1939年文协组织过作家战地访问团，由王礼锡等十三人组成，去敌后方访问；团长王礼锡即由此得病逝世。回来后还出过一套《作家战地访问团丛书》，其中有以群的《生长在战斗中》、白朗的《老夫妻》、葛一虹的《红缨枪》、宋之的的《凯歌》、罗烽的《粮食》等。虽然因为留住的时间不久，很难深入所访问区域的战地生活，但总是有一定贡献的。他们在临行前说：

自抗战开始以来，多少作家在南北各战地各前线使用他们的武器——笔去抗敌，也有许多作家，在放下笔，拿起枪，在战场上和他们的伙伴用血肉去保卫祖国；还有许多士兵、农民、工人等在壕沟中，在田庄上，在工厂里，用他们的笔去写他们亲身经历或目见耳闻的惨痛的或壮烈的经验，枪在今天不是士兵所专用的，笔也不是作家所专有的。在这无数的笔中，加上十三枝，更不新奇，更不值得夸张。不过我们十三个人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一次派出的笔部队——或者因为目的在敌后方，而叫做笔游击队——所以我们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希望